

台灣文學日譯新展望

◎ 彭瑞金

台灣文學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起步階段，重視國際化和國際交流，要與世界文學接軌的呼喊聲，此起彼落。照說文學的國際化和國際交流是完全不相同的兩回事，但兩者可能都是焦慮台灣文學外譯——譯成外國文字的問題，但它不能解讀為作品內涵的「國際化」，至於「交流」也不是單向，不是只有台灣文學的外譯，也應包括世界各國各地文學的台譯，才符合「交流」之名。

台灣文學界過去並不缺乏這種交流的經驗，無論是台文作品的外文翻譯，或是譯介外國文學的詩、文、小說，只是這些「交流」顯得零星和取樣隨機而已。以《笠》詩社為主的本土詩人，在詩的國際交流方面，有不少經驗，他們組團參加或主辦亞洲「詩人會議」多次，也出版各種外譯台譯對照的詩集，算是比較集體性的國際交流；但就內容而言，還是限於幾位代表性詩人的詩作交流，明顯欠缺「台灣文學經驗」之類的集體文學經驗的交流。在英文方面，杜國清和王德威分別在美國的西、東兩岸主持一項台灣文學外譯的計畫，杜國清主持的「專刊」都先設計有主題，再選取翻譯對象，可能要積累相當時日才能將整體台灣文學的面貌勾勒出來。大部分的外譯計畫都不脫隨機取樣的計畫主持人的「主觀」決策。至於「單向交流」的怪異，似乎都

未被察覺。

台灣文學與日本文學，由於日治時期有「接軌」的一段共同歷史，台灣文學原本就有不少日文作品，也有不少日譯人才，同樣由於接軌經驗，日本學界也提供相等的將台灣文學日譯的人力資源，這和其他台灣文學外譯的情形比較起來，是相當蓬勃。河原功、中島利郎已合力將「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」編輯出版，日本人作家作品也都陸續在日本出版。中島利郎更發揮他目錄學的專長，先後編有《西川滿全書誌》、《台灣時報總目錄》、《日據時期台灣文學雜誌》、《日本統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文獻》、《台灣教育總目錄、著作、人名索引》。這些都是台灣文學研究的重要工具書，不僅提供日本學界研究台灣文學的鑰匙，也為台灣文學通往日本學界闢了一條要道。日本中壯一代的台灣文學研究者，無論在研究方法、面向、視野方面，都有值得台灣學界借鏡之處，這是他們具有一定的外在條件的優勢。但當他們逐漸發展到戰後部分時，本土文學的學者和譯者若不能挺身而出，便要喪失交流時的主動位置。

相對於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資料的地利之便，日本學界的全面性和準確性，對戰後台灣文學的日譯便顯出主觀

強烈地隨機取樣了。岡崎郁子對黃靈芝研究的專情專注，等於打了台灣文學界一記悶棍。她不僅以黃靈芝做為博士學位論文的研究對象，也替他在日本出版了作品集，這本作品集還沒有中譯本在台灣出現，因此黃靈芝的文學在台灣也罕為人知。研文出版社出版過一套《台灣現代小說選》，選譯了洪醒夫、白先勇、陳映真、方方、曾心儀、李雙澤、宋澤萊，鄭清文、李喬、劉大任、吳錦發、黃春明、黃凡、郭笨等人的短篇小說；最近則有「國書刊行會」委由藤井省三、山口守、黃英哲編輯「台灣新文學」系列作品，已出版的包括：李昂的《迷園》、朱天心的《古都》，還有選錄張系國、張大春、朱天文、黃凡作品的《台北故事》；以及選錄王禎和、宋澤萊、王拓、黃春明作品的《來自鹿港的男人》。以上都顯示了這些日譯的主控權不在台灣的文學界，卻也可見日本的學界對戰後台灣文學，缺乏全面性的觀察資訊。

中島利郎和澤井律之兩人合譯的葉石濤《台灣文學史綱》的出版，提供了日本學界通盤了解、觀察台灣文學的機會，中文原本僅有180頁的《台灣文學史綱》譯成日文有275頁，參考文獻和解說則有30頁，索引又佔了20頁，顯示譯者也有藉此譯著令日本學界一新耳

目的意圖。雖然此書由日方學者主動選擇翻譯，但由於非個人創作，而是文學史。這在交流動向上，已具有不一樣的意義。



圖44 「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」的出版，是日本學界主導的台灣文學研究成績之一。（陳明台提供）



圖45 目前台灣文學日譯及研究的主控權都不在台灣的文學界。（陳明台提供）